

# 吴晋时期越窑羊形器研究

李 伟

(绍兴市上虞博物馆,1341488869@qq.com)

**摘 要:**青瓷羊形器是吴晋时期越窑生产的一类具有浓烈时代特色的典型器物,其相关问题对于研究早期越窑窑业面貌和吴晋时期社会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吴晋时期越窑羊形器的发现情况,运用类型学分析、文献研究、出土文物佐证等方法,探讨羊形器的烧制产地、类型区分、演变规律及用途等。研究发现,羊形器的主要烧制产地在上虞曹娥江流域,主要分为羊首开孔和背负短管两类,其器型演变与窑业技术发展密切相关。两类羊形器当有其不同的用途,羊首开孔类应当作酒尊之用,综合反映了吴晋时期的饮食风尚和精神信仰;背负短管类应当作文房砚滴之用,使用时需要借助吸子。

**关键词:**越窑;羊形器;吴晋

浙江上虞沿曹娥江流域的低山丘陵区,是汉六朝时期越窑的中心产地。吴晋时期的瓷器品质之精湛,器类、装饰之丰富,臻于汉六朝时期的顶峰<sup>[1]</sup>。这一时期此地各窑场烧制产品类型多样,有鸡首壶、虎首罐、狮形器、蛙盂、堆塑罐等带有浓烈时代特色的典型产品<sup>[2]</sup>。其中,有一类器物造型独特、刻划精美,整体呈卧羊状,头顶开孔或背负短管,常被称为“羊形烛台”<sup>[3]</sup>“羊形插器”<sup>[4]</sup>“羊尊”<sup>[5]</sup>等。本文以器物象形为据,将其统一称为“羊形器”,通过梳理墓葬出土和各地博物馆馆藏的此类器物,探析羊形器的器型演变规律,并对其烧制产地、类型演变、用途等相关问题做出分析。

## 1 发现情况和产地分析

相较于鸡首壶和狮形器等器型,羊形器的出土数量明显较少,出土区域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时代和地域均呈现明显的集聚性,与此时期越窑生产的产品主要流布区域相符。据笔者所收集的考古资料和部分馆藏所见,羊形器发现情况如表1所示。

从空间分布状况来看,羊形器的出土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交界地区和以绍兴上虞为中心的宁绍平原一带。吴晋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马鞍山、镇江等地,是当时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聚集着包括皇室在内的王公贵族

[收稿日期]2025-01-16

表 1 羊形器发现情况统计表

编号	出土地	时代	尺寸/cm		资料来源	备注
			高	长		
1	江苏南京	三国吴	25	30.5	《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 <sup>[6]</sup>	此两件为一对,同出土于清凉山吴墓 <sup>①</sup>
2			25	30.5		
3	江苏南京	三国吴	19.5	26	《南京西岗西晋墓》 <sup>[7]</sup>	发掘报告中推定墓葬年代约为 265-280 年
4	江苏南京	东晋	12.4	15.5	《南京象山 5 号、6 号、7 号墓清理简报》 <sup>[8]</sup>	
5	江苏丹徒	东晋	14.7	16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苏、上海卷》 <sup>[4]53</sup>	
6	江苏镇江	东晋	14.7	17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	
7	江苏江宁	东晋	10	16	《六朝艺术》 <sup>[9]</sup>	
8	安徽马鞍山	三国吴	21	33.2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 <sup>[10]</sup>	
9	安徽宣城	西晋	10	11.6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安徽卷》 <sup>[11]29</sup>	
10	未知	西晋	21.1	25	芜湖市博物馆藏品	捐献文物
11	安徽宣城	东晋	13.6	15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安徽卷》 <sup>[11]38</sup>	
12	浙江安吉	三国吴	10	11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卷》 <sup>[12]</sup>	
13	浙江上虞	三国吴	26	31.8	上虞博物馆藏品	
14	浙江绍兴	东晋	14.3	14.5	《绍兴文化遗产:陶瓷卷》 <sup>[13]</sup>	
15	浙江上虞	东晋	12.5	16	上虞博物馆藏品	
16	浙江上虞	东晋	14	16.8	上虞博物馆藏品	
17	未知	东晋	14	15.5	浙江省博物馆藏品	移交文物
18	未知	东晋	8.4(残高)	16.4(残长)	宁波博物院藏品	头部缺失
19	未知	东晋	14.3		《中国陶瓷全集:第四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sup>[14]</sup>	

群体,在厚葬之风和奢靡之风盛行的时代,这里无疑是高质量的越窑青瓷产品的主要供应地,而羊形器作为越窑高级青瓷的典型器物,在此地区集中出土是必然的。

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是早期越窑烧制的中心地带,其窑址调查和发掘成果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据考古调查发现,三国西晋时期上虞瓷业规模巨大,瓷窑遗存多达 140 余处<sup>[15]138</sup>,东晋南朝

① 此对羊形器 1958 年出土于南京市清凉山吴墓,现分别收藏于六朝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瓷业规模缩减,发现窑址也有 18 处<sup>[15]</sup><sup>148</sup>。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此时期窑址有鞍山窑址<sup>[16]</sup>、尼姑婆山窑址<sup>[17]</sup>和禁山窑址<sup>[18]</sup>等。但遗憾的是,系统考古调查<sup>[19]</sup>和部分窑址发掘成果中,尚未见到羊形器的踪迹。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烧制窑址尚未发现。吴晋时期上虞的制瓷业规模很大,多数窑址尚未经过系统性考古发掘。如上浦凤凰山窑址、梁湖多柱山、晾网山窑址等,其烧制产品种类丰富、质量较高,也是代表早期越窑窑业面貌的重要窑口。在众多的瓷窑址中,必然会形成产品种类烧制的分工,每个窑址的窑业面貌中都会有一类或几类代表性的产品类型,因此,羊形器的烧制窑址尚未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是羊形器属小宗类的特殊器型。就目前发现情况而言,羊形器显然是只供应少部分贵族阶层的优质产品。马鞍山朱然家族墓 M1<sup>[10]</sup>和南京象山 7 号墓<sup>[8]</sup>中羊形器的发现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朱然家族墓 M1 是三国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的家族成员墓,南京象山 7 号墓则是东晋门阀豪族琅琊王氏的家族成员墓。其余出土羊形器的墓葬,其墓主虽无明确身份可考,但规模均较大、随葬器物丰富,说明墓主身份绝非寻常,而羊形器能作为特殊陪葬青瓷器之一,也是说明其精美性和稀少性的重要例证。此外,越窑

此期的其他产品在离苏皖交界和宁绍平原两个中心较远的山东、陕西、辽宁等地也有发现<sup>[20]</sup>,而羊形器的流动情况与同期器物存在显著的结构差异,其空间分布半径呈现明显的区域局限性,属于小品类的特殊产品类型,甚至于这类器物有可能是当时窑场专门为社会上层定烧的瓷器,因此不具有一般产品的流通普适性,故而在窑址中尚未发现有此类器型的踪迹。

当然,上述两种原因探讨的有效性均受制于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即此类羊形器的产地问题。从上虞地区已有的越窑发掘和调查成果分析,羊形器的主要烧制产地在上虞地区应当是准确的。首先,从胎釉层面来看,羊形器釉色青绿、胎色灰白、胎釉结合致密的特点,与上虞地区早期越窑的胎釉特点基本一致。其次,在装饰技法上,羊形器上压印的菱格纹、戳印的点状纹、刻划的线纹等纹饰,与同时期上虞窑址中发现的洗、虎子等工艺相同;在羊四肢处划弧线、用工具拍压四周凸出羊腿的做法则与狮形器等存在相似的工艺特征。再有,从制形工艺上看,在尼姑婆山窑址中出土有许多不同动物造型的象生组件,如鸡首、牛首、马首、鹿首等(图 1),其形象塑造与羊形器羊首(图 2)的做法如出一辙,口、眼、角、耳等部位都神态丰富,说明此时期上虞越窑已存在制作羊形器等象生器物的必要技术基础。



图 1 尼姑婆山窑址出土各类动物造型象生组件残片



图2 上虞博物馆藏羊形器羊首



图3 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羊形器

## 2 分类和时代演变特征

通过对羊形器发现情况的简要梳理可以得知,羊形器的出现时代上限在三国吴、下限在东晋时期,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羊形器在江苏南京甘露元年墓出土。根据羊形器的造型特征,笔者按其开孔位置,分为A、B两型(表2)。

表2 羊形器分类情况表

类型		器物(编号)
A 型	Aa 型 I 式	1,2,3,8
	Aa 型 II 式	4,5,6,7,11,14,15,16,17,18,19,20
	Ab 型	10,13
	B 型	9,12

A 型:18 件,羊首开孔。根据器身是否有系,分为两个亚型。

Aa 型:16 件,器身无系。根据器身丰瘦状态分为两式。

Aa 型 I 式:4 件。时代为三国西晋时期,器物造型硕大,身躯肥壮,造型丰满。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出土羊形器(图3),长 33.2 cm、高 21 cm,羊头颅硕长,口微张,短直颈,颈及前腹部刻划斜线纹,腰及腹部饰宽菱形纹带,尾部刻划斜线纹,臀部有 12 个支烧痕,青釉,灰白胎。

Aa 型 II 式:12 件。时代为东晋时期,器物整体变小,造型清瘦,羊首更加立体,部分使用点褐彩工艺。如安徽宣城石板桥狮子冲出土羊形器(图4),长 15 cm、高 13.6 cm,羊昂首直颈,颌下有须,腹部两侧刻划羽翼纹,尾部为小卷尾,眼部点褐彩,青釉,灰白胎。



图4 安徽宣城石板桥狮子冲出土羊形器

Ab 型:2 件,器身有系,时代为三国西晋时期,羊身整体风格与 Aa 型 I 式相近,但羊首较短,背部有四个横向环形系。如上虞博物馆藏三国吴越窑青瓷羊形器(图5),长 31.8 cm、高 26 cm,羊张口吐舌,颌下有须,颈部刻划斜线纹,小短尾,臀部有一圈支烧痕、无釉,青釉,灰白胎,器身残缺。



图5 上虞博物馆藏三国吴羊形器

B型:2件,背负短管,时代为三国西晋时期,器身整体较小,羊背有短管,直通腹部。如浙江安吉高禹天子岗出土羊形器(图6),长11 cm、高10 cm,羊昂首张口,背有直径1.9 cm短管,后骑一胡人,双手前拱,通身施青釉。



图6 浙江安吉高禹天子岗出土羊形器

通过对羊形器的梳理可知,三国西晋时期,流行形态为羊首开孔、器身丰满的Aa型I式、Ab型及羊背短管的B型;到东晋时期,流行形态

为器身清瘦的Aa型II式。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Aa型羊首开孔的器物形态是羊形器的主要大类,是此类器物的典型形态。

此外,Aa型器物装烧方式的变化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征。如:三国西晋时期,羊形器支烧位置在尾部,方式为竖烧,即将羊形器竖置于支烧具之上,中间用泥点间隔,因此羊形器尾部有明显的泥点支烧痕迹;东晋时期,羊形器支烧位置在足底,方式为横烧,即将羊形器横置于支烧具之上,中间用泥点间隔。

羊形器在不同时期装烧方式的变化显然与其器型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上虞禁山窑址发掘出土有三国西晋时期的各类支烧具<sup>[21]</sup>,适宜承托羊形器这种特殊形态的支烧具有筒形、椭圆形、饼形等,其承托面直径一般在10~20 cm,无法满足横向烧制羊形器这类大型器物的要求。东晋时期,器物造型趋向于合理、匀称,向着高瘦方向发展,越窑窑业规模萎缩,但分布范围扩展,各处窑场生产器物釉色相对稳定<sup>[15]149</sup>,在温度控制、原料配比等窑业烧制技术上有了提高,支烧具承托面与器型清瘦、尺寸变小的羊形器相适宜,横向放置羊形器更加稳定,且烧制泥点痕位于足底,隐藏了釉面缺陷,增添了美感。

### 3 用途探讨

羊形器的定名问题一直有所争议,在以往的研究资料中,多被称作“羊形烛台”“羊形插器”“羊尊”等,从这些名称不难看出,对羊形器的不同定名,实则是对其用途作出了定义。

从对羊形器进行的类型学分析可知,A、B两型羊形器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应是两种不同功用的产品。笔者从前文的分类情况探析羊形器的用途。

### 3.1 A 型羊形器

羊首开孔是 A 型羊形器的典型特征,参考出土材料并通过文献分析可推断,此类羊形器应是盛酒所用容器,将其称作“羊尊”较为适宜。

《梁书·刘杳传》中记载,刘杳在谈及“宗庙牺尊”时说:“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sup>[22]</sup>可知以鸟兽形象作为盛酒器皿的传统自古有之。以羊形作尊以盛酒自然也是可行的,而且 A 型羊形器头顶开孔的特征正与刘杳的“凿顶”之说相符。

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一块东汉时期的“酒肆”

画像砖(图 7)<sup>[23]</sup>,画面右上方有两件跪伏状羊形器物与一方瓮置于案上,右下侧画面中一人推独轮车,车上亦装有一件跪伏状的羊形器物。画面中羊形器四肢跪伏、羊角弯曲、腿部鼓出的特征与 A 型羊形器几乎一致。画像砖整体画面描述了当时“酒肆”的基本面貌,有卖酒者、沽酒者、贩酒者等相关人物,画面中案上的方瓮是盛酒用的器皿,羊形器与其一同放置,显然说明二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实用功能。而右下侧推独轮车的画面,表现的是贩酒者推车运酒的画面,独轮车上运输的即是装满酒的羊形器。



图 7 四川博物院藏“酒肆”画像砖

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前室东壁发现有一幅“羊酒”壁画(图 8)<sup>[24]</sup>,画面中左侧绘有一酒壶,右侧绘一只长有羽翼的羊,羊与酒壶中间有“羊酒”二字。汉至魏晋,文献中常见有关“羊酒”的记载。如《汉书·昭帝纪》载:“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sup>[25]</sup>《后汉书·江革列传》载:“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sup>[26]</sup>《三国志·张旃列传》载:“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sup>[27]</sup>《晋书·王尼列传》载:“辅之等贡羊

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叹曰:‘诸名士持羊酒来,将有以也。’”接着又写到胡毋辅之等人与王尼“炙羊饮酒,醉饱而去。”<sup>[28]</sup><sup>1381</sup>当时用羊肉佐饮美酒是一种流行的饮食方式,并且常被用作赏赐之礼,而望都汉墓壁画中羊与酒的固定搭配组合也正是对此种饮食方式的真实写照。可见,羊与酒在汉晋时期是紧密结合的两件事物,用羊形器物装酒亦是饮食风尚在物质生活上的一种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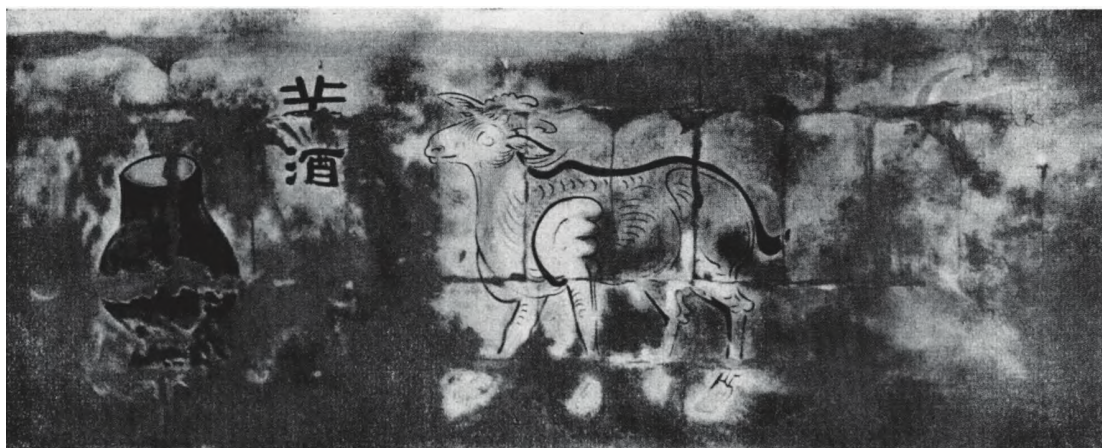


图8 望都汉墓“羊酒”壁画

壁画中羊腹部勾画出向后伸展的羽翼,同样地,A型羊形器也用点划技法表现出羊的羽翼,这说明此类“羊”表现的并不完全是现实意义中的羊,而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飞羊”,这种形象在汉画像石上也有见到。如《中国画像石全集》中的“瑞羊”画像(图9)<sup>[29]</sup>描绘的即是此类“飞羊”形象。汉画像石中还常见“翼虎”“天马”“羽人”等同样身带羽翼的类似形象,其出现的原因则与当时盛行的升仙之说有关。秦汉时期流行长生不死之神仙家言,秦皇、汉武均迷此说,认为可以通过不死之药、修炼服丹等方法不死成仙,飞升天界,故身上有羽翼<sup>[30]</sup>。如《论衡·雷虚篇》载:“飞者皆有翼,物无翼而飞谓仙人。画仙人之形,为之作翼。”<sup>[31]</sup>到了三国两晋时期,青瓷器中的羊形器、虎子(图10)、狮形器(图11)等动物形象的肖形器物,在其腹壁用刻划技法表现出羽翼纹,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图9 “瑞羊”画像石

综上所述,A型羊形器的用途应是盛酒用的肖形酒尊,除其实用功能外,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反映。

Ab型带四系的器型更是此物有实用功能的佐证。其四系对称分布于羊身上部,穿绳而过即可将整个器物提起,并能保证器物在悬空过程中



图10 上虞博物馆藏虎子

稳定且内部液体不洒出。此环形系表面素面,对羊整体造型美感的塑造起不到辅助作用,而实用性则是此系存在于羊形器上的首要功能。



图 11 上虞博物馆藏狮形器

此外,A型羊形器羊首开孔的孔位在整个羊形器的最高点,既有利于液体倒出时简单方便,又能使器内液体贮存容量达到最大,而羊首开孔又保证了羊形器放置时的整体美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羊”的形象,达到了实用性和美观性的统一。

### 3.2 B型羊形器

此类羊形器发现有2件,其背负短管的特征与同期的狮形器、兔形砚滴、蛙形砚滴(图12)等如出一辙,这些惟妙惟肖的动物形陶瓷器向世人展现了当时制瓷业的绝妙工艺,而对其进行功能性研究,是对此类器物相关研究中的重点。这类背负短管的羊形器,笔者认为应当是文房所用的砚滴,其功能与蛙形、兔形砚滴一致。



图 12 上虞博物馆藏蛙形砚滴

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文中写道:“至于向砚内注水,汉代则制有各式铜砚滴。传世砚滴有作兽形的,河南偃师、焦作与广西昭平均曾出其实例。”<sup>[32]</sup>三国西晋时期,以越窑为代表的中国制瓷业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瓷器以其优良的可塑性、较低的成本和耐腐蚀性等特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漆器、铜器进入了社会生活中,而仿铜器类的瓷器则是其中的大宗,故而各式动物形制的瓷砚滴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在三国西晋时期的文房储水类瓷器中,主要分水盂和砚滴两类。水盂常见器型为敛口、扁圆腹、平底,如上虞博物馆藏西晋越窑青瓷菱格纹水盂(图13)即为此类。砚滴类器物多为动物形,其形制分两种,一类为背有短管、无出水口,如上虞博物馆藏蛙形砚滴;另一类是背有短管、以动物口部作出水口,如浙江省博物馆藏兔形砚滴。有流的砚滴使用方式是以手按压背部管口,通过器体内外气压差异控制水流大小<sup>[33]</sup>;无流的砚滴使用方式则要借助“吸子”。



图 13 上虞博物馆藏菱格纹水盂

元代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记载,松江横云山曾有一冢被盗掘,冢内有“太元二年”纪年砖<sup>[34]</sup><sup>257</sup>,在随葬器物中有一水滴,“作狮子昂首纤尾走跃状,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须飘萧,

骑狮子背。左手握无底圆桶,右手臂鹰。人之脑心为窍,以安吸子。吸子顶微大,正盖脑心,俨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狮鹰羽毛,种种备具。通身青绿,吸子浑若碧玉”<sup>[34]258</sup>。后文又讲道,元代书法家鲜于枢也有一件大同小异的水滴,“相承曰蛮人狮子,爱之,未尝去手。寓杭州断桥日,临湖有水阁,倚阑把玩,偶堕吸子于湖水中,百计求之不可见”<sup>[34]258</sup>。文中描述颇为详细,其所谓“蛮人狮子”水滴,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M1 出土的铜仙人骑狮器(图 14)<sup>[35]</sup> 几近相同。此器长 14.2 cm、宽 8.5 cm、高 19.1 cm,仙人头顶所插带凸棱的圆管形帽,当为“吸子”。



图 14 铜仙人骑狮器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有一件铜三足砚滴(图 15),此器腹径 7.9 cm、高 8.3 cm,扁圆腹,三矮蹄足,腹部接有三个贯通小管,其上有盖,盖内接一吸管,上下相通<sup>[36]</sup>。这件砚滴所配套的“吸子”,与临沂洗砚池晋墓铜仙人骑狮器所插“圆管形

帽”,形制特点基本一致,均为中空圆管形,中有凸棱盖于器口,上部有花瓣形顶面。同样,瓷质“吸子”也基本为同一形制,《中国历代砚滴》中收录有一件南宋吉州窑白地黑彩三足砚滴(图 16)<sup>[37]</sup>,“吸子”与器身釉色一致、尺寸相合,应是同窑烧制而成。



图 15 朱然墓出土三足铜砚滴



图 16 南宋吉州窑白地黑彩三足砚滴

这类“吸子”的使用方式也极为巧妙,使用时以手指压住“吸子”顶面,使管内产生负压而吸水入器中,移至砚上松开手指,水即自管内流出。这样的出水方式可以精确控制磨墨时的用水量,满足不同的文房使用场景。

2001 年广东肇庆市端州区坪石岗东晋墓出土有一件青瓷狮形器(图 17),长 13.5 cm、宽 9 cm、高 11.5 cm,整体呈卧狮状,背负短管,内部

中空,管口上插有锥形栓塞<sup>[38]</sup>。此器基本造型与B型羊形器相似、尺寸相近,可归为同类型器物进行讨论,尤其是锥形栓塞的发现,是此类器物具有盛贮功能的直接证据。



图 17 广东肇庆出土青瓷狮形器

从以上发现的实物证据分析可见,B型羊形器与A型羊形器有着截然不同的使用场景,此类背负短管的器物当为盛贮水的文房器具,整器尺寸小巧方便提取,使用时搭配栓塞以盛贮、使水不外泄,取水时则借助“吸子”注入砚池。

#### 4 余论

羊作为六畜之一,在先秦时代就已作为特定的形象出现在各类器物之中,商代的四羊方尊是其中典型的器物。在吴晋时期,羊的形象同样深度融合在社会生活中,除食用、祭祀之外,羊也是当时贵族阶层的重要出行工具。《晋书·后妃传》载:“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sup>[28]962</sup>另《晋书·卫瓘传》记载:“玠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异。祖父瓘曰:‘此儿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其成长耳!’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

观之者倾都。”<sup>[28]1067</sup>

吴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地方割据严重,政权更迭频繁,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冲击。正是由于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性,使人们更加追求安定、美好的正常生活。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羊,祥也”。制瓷工匠以现实中的羊为范本创造出青瓷中的羊形器,用作酒具和文房用具,也在一定意义上寄托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和朴素愿景,使我们得以一窥吴晋时期的社会风貌。

#### 参考文献

- [1]郑嘉例,张盈.三国西晋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工艺及相关问题:以上虞尼姑婆山窑址为例[J].东方博物,2010(2):6-17.
- [2]宋建明.早期越窑:上虞历史文化的丰碑[M].北京:中华书店,2014:29-37.
- [3]青瓷羊形烛台(东晋)[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3):2.
- [4]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苏、上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46.
- [5]张婕,李正.西晋动物造型器物中的青瓷羊尊形象分析[J].大观,2021(3):69-70.
- [6]南京市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等.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图版128.
- [7]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J].文物,1976(3):55-60.
- [8]袁俊卿.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2(11):23-43.
- [9]江苏省美术馆.六朝艺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122.
- [10]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07(6):34-40.
- [11]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安徽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12]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8.
- [13]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绍兴文化遗产[M].北京:中华书局,2013:129.
- [14]朱伯谦.中国陶瓷全集:第4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285.
- [15]郑建华,谢西营,张馨月.浙江古代青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 [16]高宝萍.浙江上虞早期越窑窑址概述[J].南方文物,2018(2):87-94.
- [17]郑嘉励,张盈.浙江发掘上虞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N].中国文物报,2007-06-20(2).
- [18]郑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考古发掘[J].大众考古,2015(7):26-33.
- [19]杜伟.上虞越窑窑址调查[J].东方博物,2007(3):6-15.
- [20]牟宝蕾.越窑通鉴[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125.
- [2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虞区博物馆,等.浙江上虞禁山窑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24(1):85-120.
- [22]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715.
- [23]金维诺.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M].合肥:黄山书社,2009:660.
- [24]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望都汉墓壁画[M].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图版24.
- [2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5.
- [26]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1303.
- [27]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1:361.
- [2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9]汤池,武利华,王步毅.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119.
- [30]霍巍.四川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浅析陶摇钱树座与陶灯台[J].华夏考古,2005(2):86-96,113.
- [31]王充.论衡[M].陈蒲清,点校.2版.长沙:岳麓书社,2006:86.
- [3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21.
- [33]向芮仪.中国古代动物形砚滴设计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20:41.
- [3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35]冯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J].文物,2005(7):4-37.
- [36]丁邦钧.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6(3):1-15.
- [37]刘明.中国历代砚滴[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27.
- [38]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广东、广西、海南等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0.

(责任编辑:朱艳红)